

“空心化”“高中化”“内卷”……

大学生怎样走出应试教育“后遗症”

■本报记者 胡琦琦 杨晨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甘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为什么学生进了大学很不快乐?其中一个原因,现在大学越来越像工厂、院系像生产车间。”他还表示,即便是国内顶尖高校的学生也普遍感到疲惫、焦虑。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人才,高质量人才来自高质量教育。然而,近年来,升学竞争、教育“内卷化”、大学“高中化”等与大学生相关的问题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聚焦大学生成长问题,探讨大学该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教育场所,帮助那些有应试教育“后遗症”的学生重拾人生的目标和意义。

为什么大学生更难找到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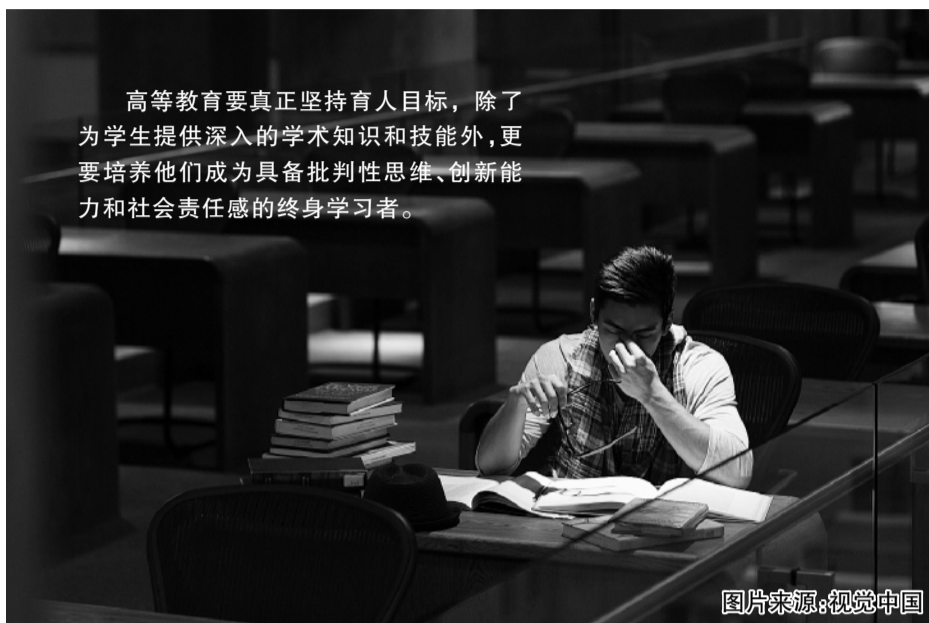
在谈到当代大学生个人成长的现状时,南通大学原校长施卫东教授提出,有一部分学生处于“空心化”状态。“空心化”一词形象概括了部分大学生因无法准确定位自我、缺少对自我需求的正确认知、缺乏持续奋斗的动力而表现出迷茫的现象。

施卫东认为,这种现象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家庭的过分保护或期待,可能会使孩子在大学阶段面临一些适应性困扰;就业、升学等竞争压力加重了大学生的精神负担,致使其在面临挫折和困难时,不能有效地进行心理调适等。

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看来,比较严重的“空心化”指的是抑郁症,而更为普遍、轻度的“空心化”就是人生意愿或理想、追求的缺失。“在去年发布的《心理健康蓝皮书》中,我们调研了大学生的人生意义感,发现很多人都处在寻找而没有获得的阶段。”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的需求会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提升。在探讨人生的意义时,大部分人已经脱离了安全、生理需求。当代年轻人越来越追求自我实现,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而这条路比追求低层次的需求更加曲折,因为想要明白“我是谁”“我要走怎样的人生道路”,本来就很难。

青少年和大学阶段是理解“我是谁”,即形成自我同一性的重要年龄段。“大学生之所以越来越难找到自我,一个重要原因是随



高等教育要真正坚持育人目标,除了为学生提供深入的学术知识和技能外,更要培养他们成为具备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终身学习者。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着现代社会职业分工越来越细,职业定位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丰富,要确定“我到底适合哪种生活方式”也会更加复杂。“陈祉妍解释,这就产生了自我同一性达成的延缓,也就是说,生理年龄成年并不意味着心理年龄也达到了能清晰认知自我的阶段。”

因此,她希望家庭和高校教育能给年轻人更多探索、尝试和参考的可能性,以及更多思考自己到底适合哪种人生道路的机会。

为什么大学越来越像高中

说到“内卷”,大学可谓是“内卷”的重灾区,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的“高中化”趋向。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大学日益“内卷”?

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俊告诉《中国科学报》,一方面是因为外部客观环境的变化。现阶段经济增速放缓,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越来越多,同时招聘要求发生变化,慢慢出现了学历“通货膨胀”,学生越来越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因此,不少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初,就将考研作为目标。“在外部环境影响下,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内在逻辑也在发生变化。当本科学历已经不再“保险”,最好是研究生学

历的环境下,同学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调整自己的目标。”

施卫东提到了教育体制导向的问题。“当前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以分数和绩点为导向。”他说,学校通过绩点、评优、评奖等方式评价学生的学术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些指标又与学生未来的升学、就业等机会紧密相连。这就致使学生们不得不为了争取更好的机会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绩点和综合素质。

此外,施卫东认为,从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看,学生们在初、高中阶段已经习惯了以分数为标准的竞争方式,进入大学后也难以改变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应对大学的学习和竞争时,他们往往会沿用初、高中时期的学习方法和竞争策略,从而形成了“卷”的现象。

李俊对此表示赞同。在他看来,尽管大学的学习方式和特点与高中不同,但同学们在进入大学后,其学习和生活仍会受到高中期间学习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塑造。特别是刚进入大学就确定要读研的学生,会形成清晰的学习策略,无法自由探索并尝试新的学习方式。

如果处理不当,这种“内卷”现象会对大学生的成长造成诸多负面影响。施卫东

强调,长期忽视个人兴趣和多元发展,会使学生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只关注如何提升成绩,这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人成长;而激烈的竞争会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身心健康问题;创新能力与合作精神也会在此过程中逐渐丧失,最终影响的是其未来职业发展的竞争力。

大学如何成为理想的样子

“在一所理想的大学,学生们需要探索和尝试,找到更适合个人禀赋、能力和偏好的目标。”李俊认为,这样的探索和尝试需要学校和社会的支持,但目前还比较缺乏,特别是过去学生接受的教育,并没有教会他们探索的路径和方法。

李俊关注到,有相当多的学生进入大学后,会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方式有很大关系。他们在经历基础教育阶段漫长的学习后,对知识已经提不起兴趣了,也少了求知的好奇心,因为过去的探索是为了应试。

“人的成长是连续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影响很深。尽管很难,但我还是希望在基础教育阶段能够以保护学生兴趣的方式,鼓励他们自主学习,从而使他们进入大学后,仍有好奇心这一内在动力,对未来抱有希望。”

施卫东则表示,高等教育要真正坚持育人目标,除了为学生提供深入的学术知识和技能外,更要培养他们成为具备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终身学习者。

为了帮助大学生在学术、职业和个人发展方面成为成熟个体,施卫东建议,高校要更新课程设置,确保课程内容与当前行业和社会需求保持一致。强调跨学科的知识技能,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除了学术知识外,还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如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领导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这些技能对于成人生活和职业成功至关重要。

此外,他还提到,需要为学生提供全面的生涯规划和辅导服务,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兴趣、能力和价值观,探索职业选择,并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同时,加强心理健康支持服务,提供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帮助学生应对压力、焦虑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日,国内某“双一流”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爱情心理学”的讲课内容引起了不少批评,有些网友的批评还很尖锐,甚至直接称之为“女德班”。当然,这种断章取义、乱贴标签的批评方式并不可取,但其中反映的一些问题也应值得讨论。

目前,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网上传播,都只有听课学生拍摄的有关课程PPT的几张照片,仅凭这一点信息并不能全面评价这门课的好坏。不过,从PPT的内容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个特点——课程讲授上的“攻略化”。

所谓“攻略”,起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细分之后。作为一种生活指南,乃是希望以最省力的方式得到最佳的结果。但“攻略”只是一种生活方法或技巧,将其作为教学模式搬进大学课堂显然不妥。

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大学处于“精英化”阶段,大家都认同教育家蔡元培有关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的定位,“攻略化”的倾向仅在个别应用型课程中有所体现。但自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攻略化”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一些大学从业者眼里,既然高校“大众化”了,就要充分体现大众性。因此,就应该迎合社会、迎合市场、迎合时尚……迎合一切可能迎合的对象。而引入高校课堂的“攻略化”教学,又是所谓寻求“不确定时代的确定性”的产物。

“攻略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实用,它与“急功近利”的做法合二为一,直接冲击大学的固有基础——专业化。现在看来,“攻略化”又是以“打破学科界限”为名加以实施的,并突出体现在应用型的“通识教育”课程中。

应该说,在大学专业过于窄化于窄化后,不仅专业间的互通中断,专业内部亦难以交流,通识教育兴起的合理性不言而喻。然而,大学专业过于窄化这一局面的背后,并不是因为坚持了专业化,而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和强化实用性。因此,从逻辑上看,应用型通识教育内容的“攻略化”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吊诡之处——它完全是用“实用”的方法来解决因过于“实用”而产生的问题。

如今的在校大学生中,自费购买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线上线下应试类课程者不在少数,培训机构纯粹“攻略化”的教学内容和旨在吸引眼球的教学趣味,不仅构筑了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想象,也给大学教师施加着无形的压力。

当然,也有教师以主动出击的姿态,直接到知名视频网站上注册账号、线上开讲,尤其在普及法律知识和文化方面,他们中确实出现了多位佼佼者。然而,社会市场总是更倾向于立即见效的“攻略”,为流量而牺牲专业操守的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哲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其只提供思考,并不提供答案。但有的哲学专业或者打着哲学名义的教师,不仅大胆地跨二、三级学科,中外哲学“通讲”,甚至像上世纪80年代的某些气功大师一样,颇为神秘地预测未来。

在大学课堂教学中,专业范围内的“有趣”与“为有趣而有趣”的哗众取宠毕竟不同。前者是建立在专业理论融会贯通之上的自由发挥,后者一旦无所约束,必然滑向低级趣味。这是专业性与“攻略化”之间的明显差异。

进而言之,“攻略”尽管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反复使用,但总体而言仍是一次性的,这是它与专业性最大的不同。专业理论为类比、联想和创造带来了可能,也是学生成长的文化营养来源,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基础。相比之下,“攻略”只是快餐。吃完后,饭盒、筷子可以和包装一起被丢弃。

另外,“攻略”一般只讲技巧,并不追问方法或技巧的合理与否。它以“能达到目的就算好”为标准。因此,“攻略化”教学并不提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不具备自我反思和道德评判的功能。这也是“攻略”与以科学性为基础、兼顾职业操守的专业性要求相左之处。

选修“爱情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之所以会对PPT上涉及女性的恋爱技巧提出“性别歧视”的质疑,就是因为这些“攻略”式的内容是将心理学的专业理论庸俗化理解,既没有遵守现代道德原则,又缺少对于技巧本身的反思。由此可见,“攻略”不仅可能轻易造成“目的”与“手段”的分离,成为唯“技巧”、唯“话术”论,甚至可能导致学习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一深层次问题或许更值得人们认真关注和思考。

总之,大学以专业化为基础特征,通识课程亦不例外,它不应该为了吸引学生眼球而牺牲专业性。市场讲攻略、文化重特色、学术求探索,好的大学教学一定是建立在专业基础之上,引导学生进一步理性地探索未知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战略研究基地副主任)

『攻略化』教学伤害大学的专业性

“非升即走”:应当“如何升”“如何走”

■王传毅

作为学术创新的生力军,青年学者无疑是国家科技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重要支撑。也正因如此,青年学者的职业发展道路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近期,某院校一项对于青年学者的人事管理规定便引发公众讨论。该规定称,对于引进的博士研究生,若在校工作满五年后未能晋升为副教授(除非是因为名额限制),需顺应学校安排,可能被调往后勤或保安等非教学岗位。

这是当前在高校人事管理领域实施“非升即走”政策的一项院校实践。“非升即走”源自美国终身教职制度,在国内也被称为“预聘—长聘制”。该制度旨在通过竞争机制,激励青年学者收获更丰硕的学术成果,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进一步优化空间。

问题:升得不容易,走得不体面

尽管“非升即走”制度仍不断为中国更多大学所采用,但被改革的群体——教师对此却往往持保留态度。

广州大学副教授李晶等学者的调研发现,高校教师选择“能接受”“预聘—长聘制”改革的群体占比仅为14%,超过85%的教师对“预聘—长聘制”采取排斥(不接受)和回避态度(不发表意见);83.6%的教师认为国内学校实行“预聘—长聘制”的时机尚未成熟。

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扭转教师岗位“铁饭碗”的传统观念难度较大。相较于我国长期奉行的高校教师终身聘用传统,“非升即走”处于试用期教师面临较大的职业压力下。一些研究发现,大部分教师在“升”之前都认为压力过大,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焦虑),对工作的满意度也有所降低。

二是很多教师对“升”没有稳定预期。一方面,“非升即走”存在较大竞争性,是否能“升”不仅取决于自身能否达到基本条件,往往还取决于在同期申请者中是否存在相对优势;另一方面,“升”所考察的要素中,国家级科研项目及顶级期刊论文是“硬通货”,但能否在聘期内获得则带有很大不确定性,既有来自学术研究失败的风险,也有来自高

竞争性的挑战。

此外,“升”的程序中虽然包括客观的“硬通货”,但仍须经过专家主观的评议投票。一旦出现专家主观评价和客观成果表现相悖的情况,就会带来公众以及利益相关群体对制度的“失信”。

三是社会对“走”没有正确认识。一旦“非升”就面临“即走”,需要寻找“下家”。此时的求职者往往被贴上“竞争失败”的标签,求职之路更加不易。所在单位也会在教师“走”之前,与其解除聘用合同,停发工资,并取消配套工作权限、子女上学等系列保障,加大求职者压力。此外,许多高校招收教职一般有明确的年龄限制(大多为35-40岁),“升”不上去的年轻人,若年纪越过“门槛”,则难觅教职。

讨论:是否应取消“非升即走”制度

既然存在上述问题,是否应该废除“非升即走”,回到“铁饭碗”制,抑或“全员卧倒”,实行取消编制的聘用制?

对此,笔者建议应充分研究“非升即走”的成效。

评价一项人事制度的好坏,标准在于能否通过这项制度,招录、用好一批支撑组织发展的人员。一项好的教师聘用制度应能吸引一批最有智慧、最有潜力的青年,并引导其以学术为天职,潜心治学,献身于知识边界的拓宽、科技的创新应用。

以此为标准,“铁饭碗”可能会导致整个教师队伍竞争缺失,论资排辈、缺乏活力,不利于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全员卧倒”取消编制则可能导致高校对优秀青年人才的吸引力下降,既无体制保障,也无高薪激励,使优秀青年人才流向资本密集型行业,不利于国家长远发展。

“非升即走”的好处在于通过较激烈的竞争,遴选出具有竞争力的青年人才,再为其提供潜心治学的制度保障,使之甘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产出重要的原创性、颠覆性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升即走”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也有观点认为,由于“非升即走”产生过度竞争,引发“内卷”,使教师晋升之后“缺乏斗志”“追求躺平”,“养一大批闲人”。但在笔者看来,如果一项制度能保护那些最有天赋的学者,使其在最有创新

力时做出最有创造性的成果,那么相较于付出的“赡养闲人”的成本,制度收益是显著的,不能苛求一项制度既有包容性,又能整齐划一。因此,我们探讨的焦点应在于如何使竞争适度,既能激发活力,又不产生“内卷”。

还有观点认为,“非升即走”的晋升依赖于项目、论文,“重科研轻教学”不利于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健康发展。然而,与其要求青年学者成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样样优秀的“六边形战士”,不如给他们适当“减负”,尤其对于教研系列、研究系列的青年教师,应鼓励他们在博士毕业时期的创造力鼎盛阶段,做一等的科研项目,解决一等的学术问题,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只上好一门与研究方向直接关联的课,让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发挥出最有效的育人功能。

总之,上述两个观点不应成为影响“非升即走”存废的理由,而应成为优化“非升即走”的方向。

建议:评聘分离、督导结合、政策保障

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深入推进岗位聘用改革,实施岗位聘任制管理,进一步探索准聘与长聘相结合等管理方式,落实和完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聘用机制。”这为“优化非升即走”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具体操作层面,笔者认为可考虑以下具体建议。

一是评聘分离,评以水平为准,聘以需求为则。“升”上岗位的要素既包括水平,也包括需求,但水平和需求不是一回事。建议实行由国家委托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学术组织,通过精准定位学术同行,组织全球范围(因研究方向也可限定为国内)的同行通讯评议,对晋升申请者的能力和取得的创新成果进行达标性和诊断性评价,既表征水平,又给予指导,提供发展建议。

同时,特别需要注意分类评价问题。对人文社科着力探索符合学科特点的长周期评价,对应用特色鲜明的学科可考虑更多创新应用和技术转化成果,要有明确的“尺子”,但不能“一把尺子量所有”。

“聘”则由高校按照需求决定,提前明